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学术争鸣】	从“文革不是什么”来看“文革是什么”	胡 平
【史海钩沉】	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	王复兴
【亡灵祭坛】	永远难忘的思念——追忆荐健同学	金文进·陈长坤·廖常初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学术争鸣】

从“文革不是什么”来看“文革是什么”

· 胡 平 ·

〔内容提要：如何给文革定性，众说纷纭。本文以为，要弄清“文革是什么”，不妨从反面着手，先弄清“文革不是什么”，弄清了“文革不是什么”，“文革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本文分别说明，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不是反官僚集团，也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毛泽东由于发动大跃进，导致大饥荒，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别人篡党夺权。唯恐自己死后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毛发动文革主要是为了权力，理想、理念更多的只是借口和手段。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破的多，立的少，只破不立，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一套成熟成型的构想，他只是急于用某种貌似理想主义的东西否定别人而已。〕

要说明“文革是什么”，我以为不妨从反面着手，先说明“文革不是什么”，然后再来看“文革是什么”。

一，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10万计。”〔1〕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2〕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3〕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

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应该特别注意的。”〔4〕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5〕。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远远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6〕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7〕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8〕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9〕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10〕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口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

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11〕。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12〕。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只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13〕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14〕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15〕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2018年7月9日于纽约

注释：

- 1，杨继绳《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12月初版，上篇，第552页。
- 2，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3—214页。
- 3，《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2月24日），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3—294页。
- 5，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转自观察者网，原载共识网，链接：http://www.guancha.cn/QiBenYu/2013_12_24_194950.shtml
- 6，同上。
- 7，人民日报通讯员《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
- 8，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 9；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载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6—23页。
- 10，同上。
- 11，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1967年第2期。
- 12，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1968年第4期。
- 13，《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 14，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 15，《毛泽东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的讲话》，1967年1月17日，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329/15/915051_20738574.shtml。

~~~~~

## 【史海钩沉】

文革史应浓墨记载的一个名字：朱成昭

• 王复兴 •

人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许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朱成昭这个名字。但“老五届”的文革亲历者们都还记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初创时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专院校早期造反派红卫兵的著名领袖。

朱成昭过早地退出了文革运动，原因是：他早在1967年1月，便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为此，1967年2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闭门思过”，从而退出了运动，退出了对地院“东方红”的领导，而后由王大宾担任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头头、与朱过从甚密。）南下广州游玩时，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在广州抓获，并带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叶被公安部正式



拘留，朱、叶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朱成昭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做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而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下令释放，先去解放军301医院学医，成为军医。后又重回戏剧界，曾以“凌子”的艺名导演电影《原野》，声名远扬。她于1972年被释放后，便对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与朱往来。而朱在长达十几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写过许多动人的情信、情诗。这大概是一位高干女儿、贵族“千金”与一位普通干部子弟之间，因门不当、户不对，在红色中国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悲剧之一。

朱成昭于1980年6月获正式平反。当时中组部准备在全国树两个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一个是死去的张志新，再一个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朱这个典型因叶剑英的反对而被勾掉。理由是树活着的典型不好。人们心里清楚：朱、叶二人在文革初期的关系；叶向真以及其父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对当局而言，是应尽量淡化，少曝光为好。

（以上朱成昭自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的经历，择要摘引自宋永毅：《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于2003年《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00期，zk0312b。）

下面，让我们回顾：朱成昭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为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又怎样从一个造反派变成“反革命”的？

## 一、反工作组，争自由

朱成昭，1941年出生，安徽人，父亲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朱成昭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的高中，在学校是团干部。高中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调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参加了一个科研项目，并担任了课题组长。后于1962年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以“调干生”名义入校。入校后曾和许多同学一起两次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朱是地院四年级学生。由于以上经历，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阅历丰富一些，本人长于独立思考，想问题较深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在1966年6月1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领导文革运动，派了大批工作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学。6月8日，国务院地质部派出以副部长邹家尤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取代了地院党委，领导地院文革。工作队是按中共中央刘、邓的指示，以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为指导思想来领导运动的。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引自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238页）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史实搞准确》，刊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87期，2012年7月10日）按当时有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

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已超额完成了1%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1957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地院工作队进校后，首先抛出了地院党委书记高元贵，指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全校进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师生认为高书记是好干部。同时，工作队矛头向下，批斗了许多一般干部、教师。工作队的作法，引起许多干部、教师、学生的不满。

6月20日，地院在校园内爆发了反工作队的游行。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学生带领下，到了工作队的办公楼下，要和邹家尤辩论，后被保工作队的群众和工人解了围。

6月22日，副总理薄一波针对“6·20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其意反工作队即反党。

6月23日，由原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牵头、有王大宾等47名师生签名的“大字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贴出，该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工作队的围剿、打击。参与这张大字报的干部、教师、学生成了各系、各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并被工作队内定为右派。

6月25日下午，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反复播放薄一波的批示，围剿反工作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工作队关闭了学校两个大门，没有工作队放行条任何人不能自行离校，限制师生的行动自由。凡参加了6·20游行和贴了反工作组大字报的师生，都要逐个挨批，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等待处理。李贵、王大来等十三名干部被拉到全院大会批斗。王大宾在探工系成了批斗重点。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7月25日、26日两天，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场举行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会由江青主持。江青、陈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支持了批评张承先工作组的师生，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消息很快（26日晚）就传到了地院。

7月27日，地院的王大宾、蔡新平、周永璋、伏庆是、殷维候、杜金山、庄一龙七人翻越学校西面围墙，逃离地院，到北大找聂元梓取经。七人见到聂元梓。聂介绍了北大25、26日大会情况，表示支持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行动。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写个“大字报”，由殷维候执笔，题目是《走访北大的声明》，七人签名后贴到北五楼底大门外墙上，马上引起轰动，观者云集。大字报透露，从聂元梓那里得到信息，95%工作组犯了错误，工作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队打压的师生受到极大鼓舞。

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代表大会，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13日，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向地院师生作了一个小时检查后，带领200多人的工作队撤离了地院。邹在检查中，并没有否定工作队的方

向与路线，也没有肯定师生对工作队的批评，没作任何道歉。工作队撤走前，组成了以保工作队的师生为骨干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组建了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工作队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队两派师生的对立与争论。

工作队撤走前夕，水文系学生朱成昭，带领51621班郑文卿等同学，组成了地院第一个造反派战斗队“爆破战斗队”，张贴大标语，要彻底批判工作队在地院打击一大片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不能让邹家尤、工作队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见立即得到地院造反派师生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8月8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师生代表开会，组建了全校性的“东方红战斗大队”，朱成昭为总勤务员、一把手，核心组有王大宾。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时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对工作队提了些意见，结果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学生”（有问题的右派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内定将来要“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一位副队长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观点一致的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了梁山，8月8日成立了全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大队”。紧跟着于8月17日进一步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全校造反派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有上千人，核心组有：朱成昭、王大宾、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王大宾为二把手。“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笔者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们炮轰走资派的大标语。很快，地院“东方红”的名号传遍全市、全国，成为著名的造反派，影响很大。由于“东方红”反对中学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很快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地院“东方红”牵头，串联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个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与保守派为主的一司、二司相对立，成为全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据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说，“首都三司”从未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是实际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受压，周恩来、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东方红”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东方红”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造反派队伍。朱后来又请蒯大富担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领头作用，威名赫赫，在群众中有极高声望。

## 二、四进地质部，争人权

1966年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上千人一进地质部，游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门内地质部大楼，开进大院静坐示威。行动总指挥是朱成昭，副总指挥蒋良朴、杨雨中。静坐二小时，要求地质部领导：令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检查；工作队向地院师生道歉；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突然发生由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闯入地质部大院，对地院师生声讨、谩骂，高呼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由于地院师生的克制，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至24日凌晨四点左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笱到地质部，传达中央指示：

- 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 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 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8月24日，地院“东方红”撤回了地院，当晚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东方红”与保工作组的“斗批改兵团”展开辩论。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到会，听取意见。“东方红”贾振远、蔡新平等上台发言，激烈批评工作队压制、打击群众，开展反干扰、抓游鱼的方向、路钱错误。“东方红”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在中央文革

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陶鲁茄表态支持了“东方红”。大会后，保守派“斗批改兵团”一蹶不振，日渐式微，名存实亡。

1966年9月5日，地院“东方红”上千名群众，二进地质部静坐。总指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中协助。“东方红”要求：地质部交出邹家尤，回地院接受群众揭、批、斗；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晚上九时，“西纠”的头头孔丹带领“老兵”，再次赶到大院进行压制。“西纠”用地质部广播台攻击“东方红”，用纠察队把“东方红”包围在楼下院内，限制行动。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西纠”司令孔丹母亲、时任国务院秘书）第二天打电话给儿子，要他们撤退，“西纠”这才撤走。

地院“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当年很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当年“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称其为“保皇派”）矛盾背后的社会意义。“西纠”司令孔丹在“东方红进驻地质部事件”47年之后，在其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2013年6月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对此事件回忆说：“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孔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王大宾回忆说，那天薄熙来也参加了“西纠”的行动。

事过49年之后，在《王大宾回忆录》第35页，王大宾对此事件评论道：

孔丹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是的，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人，对被“老干部”仅因其对工作队持批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应是完全不同类的人，他们始终是无法理解、同情我们这些“右派”的处境的，还竟敢起来向“老干部”争取自己的人权，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不行的。

王大宾以上评论很精彩。他点出了当年造反派争的是什么？是：人权！“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具有反抗专治统治的性质。而“西纠”当年出于保爹保妈的垄断利益，打压造反派确是权贵子弟的天然反应。

二进地质部坚持了十三天，而后“东方红”核心组听取了肖力的意见，于19日撤回了地院。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当时常去地院调查并支持“东方红”。

10月8日、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又三进、四进地质部，揭批何长工、邹家尤执行的资反路线。

此处笔者对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间对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指从1966年7月反工作组至当年10月，再至1967年1、2月批刘邓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于66年8月兴起的高干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他们扫四旧，进而搞恐怖的红八月，在首都打死1772名“黑六类”，后来发展成“联动”，他们从来不自诩为“造反派”，反而被群众称为“保皇派”。1968年8月开始进驻大专院校的工宣队，更不是什么造反派，工人们自认为是“领导阶级”，他们反而在“肃清516分子”的运动中是镇压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于1967年2月以后分裂，分裂成新的两大派，大打内战，

争权夺利，争占山头，武斗，此时的造反派已经变质，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内斗派”、“山头宗派”、充满“派性”的“武斗派”。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们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乱。笔者记得，在2016年6月于美国洛杉矶举办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清华教授秦晖就曾即席发言，认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造反派”存在的时间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晖的意见一致。

到1966年10月，“保”与“反”资反路线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周在讲话中说：“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援一些人压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反革命’、‘右倾’等帽子应该统统取消。”“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持。”

10月1日，林彪发表国庆讲话，号召批判“反对革命的反动路线”。

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路线的批判，上纲越来越高。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使路线斗争大大升温、升级。十三期社论后，全国掀起了批资反路线的高潮。

10月6日，“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红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名外地到京串联的学生参加大会。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立场鲜明地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蒯大富宣读了大会的誓词。

10月中，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二人检查的传单传遍全国。当时笔者在重庆，看到了二人检查的记录传单。陈伯达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在讲话中，尖锐批判了老兵的“血统论”对联，指出它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世袭论。这个讲话影响很大，笔者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几个同学当时在重庆大学串联，看到讲话的传单后，马上借钢版刻印、油印，四处散发。

11月初，笔者所在的北大“红旗兵团”的“红梅战斗队”回到北大，11月中时，“红梅”队长徐森被“红旗兵团”任命为动态组组长。徐森当时代表“红旗兵团”去地院“东方红”参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串联会，讨论形势。徐森回校后向战斗队传达了朱成昭的发言。朱分析形势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随着批资反路线的深入发展，中间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拢；左派（造反派）迅速壮大，由少数变为多数；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数变为少数。左派应乘胜前进，彻底孤立保皇派。11月中至12月的形势，确如朱成昭所分析。

从1966年6月到12月，朱成昭等地院学生反工作，自发成立“东方红公社”，串联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资反路线。可以看出，当年的造反派具有鲜明的反迫害，争自由，要民主的倾向。他们的造反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党的运动，如“土改”、“反右”、“四清”等党的运动。文革的造反运动是体制外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反应了这种情况。朱成昭等学生成立的“东方红”、“首都

三司”，有明显的实践“结社自由”的倾向。他们批工作组，四进地质部静坐，更具有明显的争取“言论自由”、争取“监督权力”的倾向。而在10月至12月要求“销毁黑材料”的斗争，更是体现了反迫害、要人权的公民运动的特点。

### 三、销毁“黑材料”，反迫害

从1966年10月至12月，在地院以至全国，曾发生过一场以销毁工作组“黑材料”为重点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是从6、7月开始的北京及全国各高校反工作组斗争的延续。从10月以后，这一斗争是伴随着批资反路线展开。全国各地工作组在50多天里，不但在运动初期把许多学生、教师打成了右派、反党分子，而且为着准备在文革后期大规模反右，划右派，许多工作队对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进行了左、中、右排队，对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右派言论做了记录，对反工作组的人拉出了名单，还有告密信、个人检查等等污点材料。工作组撤走后，有些工作组对这些材料没有销毁，而是转移到了派出工作组的“老家”各省市、中央各部委党委的有关档案部门保存。反工作组的群众普遍称其为整人用的“黑材料”，对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后算帐”，也害怕塞进档案里跟着自己走一辈子，因而坚决要求销毁。

十七年来，用履历、出身登记表、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检举信、污点记录等个人档案、“黑材料”来控制人，整治人，搞内控，区别使用，这本来就是各级党委惯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们对此早已深恶痛绝。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一“紧急指示”对动员群众掀起销毁“黑材料”的反迫害斗争起了极大作用。“紧急指示”指出：“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也可以当众销毁。”

笔者记得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当时在各地张贴，无论笔者走到那里，包括在外地大串联，处处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转抄的大字报。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销毁整人的黑材料。一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众在批资反路线的同时，追讨、销毁“黑材料”的风潮。但许多中央部委、省市、省委不肯交出、销毁“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在与领导谈判失败后，举行了示威请愿，静坐抗议，甚至占领政府机关办公室，搜查、抢夺“黑材料”，甚至为此发生武斗。12月在杭州，由于浙江省委把工作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军区，“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联合行动，发动上千人两次冲击省军区大院。震惊中央，轰动全国。在北京，地院、清华、北外、矿院、农大、北航、广播学院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有关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销毁“黑材料”的群体性事件。周恩来于10月22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对地质学院的群众代表说，地质部工作组在地院“搞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指示尽快销毁。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师生赴京告状代表时说“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群众性的烧“黑材料”，反迫害的斗争持续至1966年年底。

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众追查、销毁“黑材料”的群众性斗争，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毛的司令部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望。群众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是当时的普遍心理与情绪。当时流传一个歌谣：“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许多地方贴这个标语，反映了造反派受压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奋起反抗的感情。

这一群众性反迫害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6、7月反工作组开始），10月5日公布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后，在10、11、12月达到高潮。这一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由于得到中央的坚决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人权运动。它的鲜明特点是：反迫害，反专制，争自由，争人权。笔者认为这一反迫害的群众性大规模行动，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这是人民群众在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萌芽。而群众反迫害的斗争能取得重大成果，因为这一社会运动与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与毛泽东要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打倒政敌的战略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对人民而言，这是难得历史机遇，或曰“机会”，朱成昭等地院同学抓住了机会，发起争取自身权力的公民运动，走到了时代潮流的前端。但人民所争得的成果没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销毁了，不等于就没办法“秋后算账”了。过了三年，到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很多账就开始清算了。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矛头向下查群众，查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没有严格标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许多属于受“怀疑一切”极左思潮影响犯错的青年，应属于思想教育的对象，却被打成反革命。全国清查了300多万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许多人自杀。仅四川在1970年前8个月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就有3887起自杀，死亡3331人。（据东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受害者》2016·1·25《中国禁闻网》）地院清查516，自杀的就有李思田老师、李明哲老师、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李贵老师跳楼摔断了腿（据《王大宾回忆录》178页）。地院清查516的最后结果是：没有一个516！全国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中头号的第一大冤案。（注：以上追查“黑材料”群众运动的资料，择要摘自王复兴：《抢救记忆》第四章第5节。）

#### 四、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朱成昭按照周恩来、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朱成昭前后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966年12月15日到成都，找到三线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王大来等人与彭进行了长谈。彭坦诚地谈了大跃进中的问题，谈了自己在庐山上所提意见。结果王大来等人被彭感化，对彭产生了同情，认为彭案是冤案，不应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败。于是朱成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宾等去成都揪彭。王大宾12月18日到成都，见到第一批抓彭的王大来等人，听了王大来详细汇报与彭的谈话，而后王大宾也与彭进行了长谈。结果王大宾完全认同了王大来的看法，认为不应揪彭，应向中央反映意见。于是王大来马上回京向朱成昭汇报。朱此时也开始同情彭，派杨雨中去中央文革汇报意见，并上交给中央文革地院学生与彭交谈的长篇记录稿。企图说服中央文革，结果遭到戚本禹严厉批评。中央文革立刻换马，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揪彭回京。这时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乐成等100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时北航红旗已从三线指挥部于半夜把彭偷走。地院东方红仗人多势众又抢回了彭德怀，双方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两派武斗。（天、地派也并不是由此而分裂、产生。其实，王大宾、韩爱晶虽一个是地，一个在天，但都否认有天、地两派。揪彭事件也并没造成两家分裂。）

12月27日地院100多人与成都军区共同乘34次列车火车护送彭帅抵京。在西直门火车站，朱成昭拒绝执行戚本禹所传达的周总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坚持要把彭带回地质学院。谁也拧不过他。（朱显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来、王大宾的意见弄明白，又或许想与彭帅详谈，深入了解彭案是非。）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上11点。朱还没来得及与彭聊天，凌晨三点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地院传达周恩来指示，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彭被卫戍区带走。但朱成昭

扣留了彭德怀随身携带一小箱机密材料，内有他的庐山“意见书”、有他后来写给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朱成昭详细阅读了彭的资料，还让人全部抄写了一套，在“东方红”核心圈内传阅。几天后，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1967年1月4日，朱成昭对王大宾讲：“对老头子的看法，你是对的。”“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1967年7月26日，北航与地院在北航大操场，举行了联合批斗彭德怀大会。以北航为主，在北航召开，地院很低调。实际上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等人对斗彭很抵触，但不得不应付。此时朱成昭已离开核心组，脱离了运动。

当时像朱成昭、王大宾这样看待彭德怀的，在地院“东方红”不是一、二个人，而是有一批师生，如：王大来、钱新、陈保堂、杨文远、郑文卿等等。他们与彭帅接触、交谈后，根据自己在1958、1959年的亲身经历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感受，又看了彭的“申诉书”，认为彭在庐山讲的是实话，是正确的，把彭打成反党分子是冤案。这便说明了几个问题：1，“造反派”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乌和之众”，他们并不盲从，而长于独立思考；2，他们并不“唯上”，而较“唯实”，对“非实”事物，敢于大胆怀疑并反对；3，文革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毛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毛的这个说词早在文革初期就传开了。朱成昭等人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揪彭、批彭是错的，这便势必发展到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质疑。4，地院“东方红”前后两次反对从成都揪彭回京，顶撞了中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评：“立场动摇”，“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朱成昭们心里不服，于是对中央文革开始怀疑、反对。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紧跟着于1967年1月开始，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两件事在时间上紧紧相扣，这绝非偶然。5，地院“东方红”揪彭的经过是对“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论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会对揪彭两次抗命。地院“东方红”当初反工作组，也并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压迫而造反。内在的动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东方红”成都三次揪彭史料，择要摘自《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 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1967年元旦刚过，朱成昭召开了一个分析文革形势的内部讨论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黑会”。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运动的看法。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没有不透风的墙，1月20日左右，朱成昭在“东方红”内部会议的讲话被传了出去。“丛中笑”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有攻击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这张大字报很快引起“东方红”内部一些人对朱的声讨，“东方红”内部乱了起来。同时，有人向中央文革递交了材料，报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论。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陈伯达给朱成昭个人的一封信。王广宇向朱成昭念了这封短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变成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陈伯达的这封信本是不用传达、不用公开的。但朱成昭自己却把信公布了。这就公开了朱成昭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了朱对中央文革的意见。于是地院马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闹出这么大动静，“造反派”竟然反戈一击，炮打中央文革，此举震动了京城和全国。



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要朱成昭“闭门思过”，想让他做个检查过关，“检讨归队”。但朱就是不听劝告，死扛着不作检查。1月24日，朱进一步行动，召集叶向真、王大宾、蒋良朴、杨雨中、杜金山、梅建明、张九九（最高检检察长张鼎臣女儿）等人到梅建明家开会。朱在会上分析文革形势，说：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击面太宽。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许多管生产的干部都弄出来批斗或打倒靠边站，谁抓生产？联动的人都是些中学生干了些坏事，但对这些小孩还是个教育问题，怎么都给抓起来、关起来了？朱又说，现在军委与中央文革有明显矛盾，中央军委是抵制中央文革这条路线的。朱说，我们要站在军委一边。要是不解决好打倒老干部过多过宽的问题，文革就可能最终要失败。而文革的失败，也是关系到我们造反派的大事。在这次会上，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师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帅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说，“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师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

此段时间，朱想向中央文革汇报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多次联系中央文革要求接见反映情况，但中央文革总是回复，没时间，等有时间再谈。朱等得烦了，对友人说“中央文革实在不愿意听我们意见，我看就要写大字报了。”

1967年2月初，“东方红”整风小组要求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作出检查和交待。朱决定借整风之名，将观点全盘端出，让群众评判。2月4日晚，朱成昭在大饭厅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这是个假检查，真炮打。这个会有三万多人参加。据王大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对朱的检查录了音，并保存至今。朱借检查之名，公开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系统地批判中央文革，影响了众多对文革抱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的检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朱的这个检查，要害是4、5、6三条，说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击面太宽，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便击中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要害之处，既使今天看来，朱在1967年2月便能有此洞见，实为难能可贵。第3条，批评中央文革“运动群众”，恰恰说明“造反派”反对“奉旨造反”，信奉“自己解放自己”。第7条说自己要站在中央军委一边，说明朱已从叶向真那里了解到中央几位老师、副总理的二月抗争，并选择站在“二月逆流”派一边，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绝不能容忍的。

3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离开了“东方红”核心组，被命令“闭门思过”，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东方红”这面红旗不能倒。

此后，朱成昭被隔离居住，但一直拒作检查。1967年7月时，他和叶向真南下广州游玩，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令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广州抓回北京。而后朱、叶被隔离审查，再后来二人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这一专案当时被宣布为“叶朱反革命集团案”。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林矛盾日益突出，叶剑英再次获毛泽东信用，年底叶向真被释放回家。一年后，叶向真转行学医，先后在首都医院和301医院做了七年医务工作。1978年重回文艺界，以“凌子”的艺名导演了电影《原野》，反响热烈。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朱成昭的命运则与叶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从监狱放出来，受连累的蒋良朴、颜宽同学同时从监狱放了出来。但朱成昭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初随商业大潮到上海下海经商，一度做得规模很大，后因种种原因失败。而后归隐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监村潜心研究文革史，1998年9月25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仅57岁。据说朱去世前，写过不少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遗作，这要等待他的同学、好友、亲人作努力了。

1980年朱被平反后，据说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与活着的朱成昭，同时树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在全国宣传。朱成昭这个典型因叶剑英反对而被取消。宣传朱成昭难免会牵扯到叶向真……

对于朱、叶的不同命运，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曾感叹：“想起孔丹的话：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老红卫兵，自认和朱成昭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具有本质的区别’。你就可以理解，同为‘叶朱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叶向真、朱成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 ◇ 结束语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茫、彷徨，再走向觉醒的杰出典型。他是走向觉醒的先知先觉者。

但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一是，他当时不曾像张志新那样，穷追到底，追踪文革错误路线至其罪魁祸首，这与那一代青年沉浸在“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迷雾中有关。朱成昭批判文革远不如张志新彻底。二是，他过于同情“联动”。虽然他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诛，把小孩子关进监狱，这是破坏法制。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说什么“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兵（指联动）掌权。”说明他仅是从路线上批判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过左，是太具破坏性。而认识不到四三派与联动争论的核心是：人应按血统分为高低贵贱？还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对的是权贵的特权。朱认不清“联动”的实质，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党专制下的权贵特权制度。这方面，他受叶向真的影响很大。他当时不可能达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经历启发人们，文革史中有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1967年2月后，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己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聂元梓的儿子大胖于2018年4月25日对笔者的长谈中，对此有深入披露。大胖说：“1967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错误，

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杨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职不干可以试试。”于是聂没有像朱成昭那样跳出来，而是采取了争取退出运动的较为安全的策略。

聂元梓、朱成昭，他们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在文革第一波浪潮过去之后，于1967年上半年，便会对叛逆发生叛逆？对造反进行造反？会不约而同地怀疑文革、反对文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文化中造反派的异化现象。

2018年9月2日

~~~~~  
【亡灵祭坛】

永远难忘的思念——追忆荐健同学

· 金文进 · 陈长坤 · 廖常初 ·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荐健同学罹难已逾四十七年，其音容笑貌宛若目前……

1970年前后，已经是毛主席亲自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一年半了。清华园里没有出现任何的生机与希望，反倒是一片死气沉沉。空气是沉重的，四千名零、零零两个年级（指文革前进入大学的最后两届学生——编注）的学生心里躁动异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想再继续呆下去了，他们想改变一种生活，渴望着尽早走入社会。

是啊，一年半的时间不算很短了。工宣队进校制止了清华两派的武斗，恢复了正常的学校秩序，同学们是由衷地欢迎的。但是，同学们期盼的大学生活却依然没有踪影。

最高指示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工宣队肩负领导大学的使命，似乎就是对我们进行改造、改造再改造。于是，我们每天的功课就是从宿舍到汽车楼，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学习最高指示，进行斗私批修。几个月后，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的负责人迟群作动员报告，号召有问题的师生要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所有的问题都倒出来，清华是全国的典型。

我们汽02班天生是一个温和的集体，在学校零字班中再平常不过了。在清华团、四两派严重武斗期间，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参与，而是选择打道回府——当逍遥派去了，留在校内的不过五、六位，而且即便留校的也鲜有参与武斗的，更绝不参与对学校领导干部与老师的暴力行动。所以清队，我们班没人受到波及。

清队之后，当然不会让我们闲着，就是没有休止地下乡下厂接受教育了，说白了就是劳动改造。我们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到京郊高丽营拔过麦子，到通县双桥农场割过稻子。农村去过了，工厂更不能落下，到北京汽修七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汽车厂，号称专业对口，实际上，我们除了劳动就是劳动，没有学一天的专业。这样的生活，不厌倦才怪了！我们都盼望结束这种生活，更何况我们的九字班学长都提前走人了。

工宣队的领导似乎也黔驴技穷了，再这么圈着学生也不是办法。1970年初终于传来了让我们“毕业”的消息，而且是零、零零两个年级同时走人。清华还是全国试点单位，3月先行毕业，其他高校则要稍后。消息传来，我们都很兴奋。迟群亲自给我们作了毕业动员。为了给自己贴金，他还盛赞我们这两届学生是清华历史上质量最高的学生，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还调侃说“清华毛毛虫，出去一条龙”。

动员之后，各班的工宣队就开始逐个与学生交谈，征求意见。

我们班的工宣队员一共是三人，为首的是杨克俭师傅，好像是新华印刷厂的。另外两位都姓刘，一高，一矮，我们叫一个大刘，一个小刘，来自北京汽修厂。公平地说，平常他们与同学们的关系也还不错。

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所有同学都先后落实了分配的信息，只有荐健同学没有动静。当时不让按时毕业分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在武斗中致人死伤的学生就不让毕业的。工宣队师傅说荐健有严重的问题，要推迟毕业，不能分配。据有同学回忆，几天前工宣队就派人抄了荐健的家（宿舍，也就是他的床），抄走了他的日记和部分书籍，以搜集反动证据。

我们班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道荐健有什么问题。文革中，我们的印象荐健既不团（派），也非四，没有参加武斗，手上没有血债，他的家庭出身也没问题。工宣队透露说荐健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不满，有不敬言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不科学等等，因此荐健必须作出深刻检查，检讨不深刻就不能毕业。为此，工宣队师傅要求汽02班团支部要帮助荐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作深刻检查。

文革中，学校的党团组织全部停止了活动。工宣队进校后，于69年底逐步恢复了党团组织。汽02班没有一位党员，因此也就是成立了团支部，陈长坤为团支部组织委员，书记好像是刘俊杰（或孟嗣宗）。在70年3月11或12日的某一天下午，在工宣队师傅亲自坐镇下，团支部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帮助荐健同学。但是，说实在话，汽02班的所有团员，包括所有团干部都不认为荐健有多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专门召开的帮助会上一点火药味也没有，大家的发言只是机械地按工宣队的说法要求荐健作一个认错的表示，大家内心里还是希望荐健能与大家一起毕业。荐健同学在会上似乎没有表态。

工宣队对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满意，他们要亲自出马。据说当晚，有工宣队某人亲自找荐健谈话。究竟是哪一位，究竟谈些什么，无人知晓。但是第二天，荐健就不见了。

工宣队员急忙派几位同学到学校各个角落及市里有关的地方寻找。

金文进同学深感事态严重，曾对去寻找的同学说，应该到这三个地方去找：一是香山的树上有没有挂着；二是南京长江大桥有没有跳江；三是泰山有没有跳崖。这几个地方都是他曾经游历，并且回来赞美过的。当然没人把金文进的话当回事，同学们都在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学校。而且多数同学还是认为不会有多大的事，荐健可能是出外散散心，早晚会回来，早晚会毕业。没人去这三地方找。

3月14日，陈长坤第一个离校。到18日，所有分到外地的同学全部离开了学校。当年零、零零两级留校的学生有700多人，但汽02班只有三位同学留校，大概是当时学校所有班级中留校人数最少的班级之一了。

1972年前后，我们在外地的同学陆陆续续地从不同的渠道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我们班的同学荐健没有等到毕业的一天，自他在毕业前夕离校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自杀了。而且据说他是以一种决绝的方式从山东泰山的舍身崖上飞身跃下的，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4岁。据说死时，他还给他的父亲留下了一句话：你的儿子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献身了！

噩耗传来，汽02班的同学无不感到意外，无不感到痛心。一个和我们朝夕相处近六年的好同学，一个身心健康、青春年少的清华学子就这样地走了，走得匆忙，走得惨烈，来不及说声再见！许多人都在心里暗自发问，荐健同学，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你为什么要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为什么要轻生啊？就不能忍一忍吗？非要戴一个“反动的帽子”走吗？

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都在各地底层挣扎，都还在接受再教育，我们无暇过问，也无权过问。我们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哀念，祈祷！

打倒四人帮以后，听说系里为荐健开了追悼会，他的姐姐代表亲属到校。可惜四十多年过去，现在已难寻悼词和有关的资料了！当年的关键人物——工宣队员也已不知去向。荐健的父母早已过世，他的姐姐年事已高，对往事她们也不想再提。

四十年后，汽02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已经退休，大家重聚清华园。一群白发翁媪，回首四十年前，大家不由地谈到了荐健，又勾起了几多回忆：

荐健，沈阳人。单从外表上看就与众不同，一米八几的身材，魁梧的个子，方型大脸，脑袋似乎比我们班上所有同学都大，一头棕色略带天然卷曲的短发尤其显眼。大家在心里都有点疑惑，他是否是混血？

金文进曾几次从殷佩霖同学手里抢来推子给他理发，边理边说着：“我开收割机在东北大平原上割麦子啰！”

荐健曾经担任汽02班的政治课代表，他似乎对政治有一种特别的喜好。那时，教我们班政治课的是寇士琪老师。寇老师很有口才，枯燥的政治在寇老师的口里却能讲得生动有趣。文革初，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曾经席卷清华园。寇老师曾勇敢地站到大礼堂上与血统论者激辩，并被赶下台。

文革初期，荐健表现也与众不同，他曾领着我们班几个同学到乙所找校领导询问，原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亲自出面接待，回答了荐健代表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1966年6、7月份，荐健的形像留给大家的印象很深刻：上身是白圆领汗衫，下身穿一条旧长裤改制的蓝色大肥短裤，一手端一个特大白色搪瓷缸，一手摇着大蒲扇，晚饭后，在闻亭或水木清华独坐，常常深夜回屋。他在思考，思考眼前这场运动会怎样发展。他得到的结论是，现在中央派工作组来清华、北大搞运动，然后把学生派往全国当工作组，在全国搞运动，像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参加四清运动一样。后来的大串联，似乎就像荐健的思路的演化。作为政治课代表的荐健，对政治有着相当的敏感。

在随后大串联的几个里，荐健去了许多地方。以至我们调侃说过：“荐健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1967年初，荐健来到无锡，当时我班金文进、庄无咎、张以平、殷佩霖、王桔廷几位同学在无锡油泵油嘴厂劳动，我们一起游览了锡山公园和太湖。

金文进同学回忆：大约1967年，，有一段时间，荐健沉闷下来。一个傍晚，我和他在工字厅聊及当前的文革运动，谈到江青的时候，他对这位如日中天、身居“中央首长”的第一夫人，轻蔑地称其为“娘们”。而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一事，说出“未必”一词。我当时非常吃惊，对他的说法不敢深想，更不敢告诉任何人。但是，我对他产生了判断：荐健对文革有自己的想法。

荐健还是一个热肠的人。1967年，我班史名垂得了重病，住到北医三院。1968年，荐健一直伺候着得了白血病的我班史名垂同学，求医、问药，联系血源。当我们躲避武斗回老家时，他一直在医院，直到料理完史名垂同学的后事。这件事，表现了荐健的热心、侠义，对同学的友谊和爱心。另一方面，也起到回避运动的作用。

史名垂走了，工宣队来了，荐健回到了班里。

那时，工宣队员每天组织全班同学一起学习文件或文章。其实当时许多人对工宣队产生了抵触情绪，高压之下，不得不低头。荐健却采取了对工宣队抵触的行为，坚决不来班上的“学习班”。荐健不愿参加集体学习，而要坚持自学。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从“根上”开始学起。要系统地学，不能断章取义，“活学活用”。徐志军回忆曾见他在寝室里看《法兰西内战》一书，他还当面指着某位工宣队说你看过这书吗？

他的见解现在看来，是十分正确的，而在当时是要遭到批判的。鉴于此，荐健并没过多地公开他的思想，发表言论，而是在痛苦地抵制，默默地承受着恶劣环境的巨大压力。

有一次系里召开批判系总支书记蒋企英大会。大会组织者领呼口号：“打倒蒋企英！”“蒋企英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都举手跟着喊，只有荐健不张嘴也不举手。当狂热的青年们彻夜拥挤在五道口书店门口，煞有介事地争购尚未出版的“毛选五卷”时，荐健却在研读马克思、孙中山、黑格尔的书。他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是凤毛麟角，高压之下宁折不弯的性格更是稀罕之极。

1969年4月1日晚，8点钟的中央广播新闻里通告了中共九大开幕。校园里又是一夜狂欢，欢呼九大开幕，全北京乃至全国都在狂欢。二号楼宿舍里却静悄悄，荐健同学躺在床上，肯定不会睡着，不知想些什么，不屑随波逐流。金文进推门进去，不打开灯，黑暗中劝他起来，出去走走，这么重大的政治活动不去表个态，会给他带来麻烦。荐健却很少开口。金文进甚至说到，我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毕业时，他大声说：“还能不给我毕业？”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还是没有起来。

金文进回忆：1969年五月，我和庄无咎同学买了张公交月票。一天，我俩邀上荐健同学去八达岭玩。从德胜门乘长途汽车到南口转火车。一整天荐健沉浸在欣赏巍峨的长城、春光明媚的山色之中。我们想趁他高兴之时，劝说几句。可是几次一提话头，荐健便一口回绝：“不说那个，今天是来玩的。”从八达岭回来，荐健和我决定步行到南口，庄无咎仍然乘火车到南口。我俩乘着傍晚的山风，在下坡路上一路小跑。载着庄无咎的火车却蹒跚来迟，行如虫爬，到一个车站，还要歇好一会儿，以冷却刹车发热的铁轮子。铁路和公路在峡谷的两侧蜿蜒向下伸展，火车在我们的左侧山脚下时现时隐。我俩的双腿常常跑在火车的前面。待我俩在南口挤上回北京的最后一班公交车时，天已黑了，笑话庄无咎要在南口过夜。

不料，到德胜门下车时，发现庄无咎也从另一车门下来，三人一阵欢笑。这天，荐健玩得很高兴，我和庄无咎却有失所望，没能劝动他。

荐健同学热爱生活，喜好广泛，爱写诗歌，有一阵还买菜做饭。荐健很有情趣，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会张罗同学们去颐和园，去香山赏雪游玩。毕业前的一个雪后，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游览北海公园，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海公园。雪后的北海异常宁静，空中传来一位女士高亢的歌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荐健和大家一样，留恋着即将离开的北京。荐健企盼毕业、企盼离校、企盼早日到社会中去安身立命。

荐健，一个多么好的同学啊！热爱生活，充满激情。很难想象，这样的同学会上绝路？你既不反党，更没有反对毛主席，你没有喊过反动口号，也没张贴过所谓反动大字报，甚至你在临终之前想的还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过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青年，难道思想也有罪吗？你不过是在小范围里吐露了一点个人对时政的看法，为什么不就让毕业？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压力，是谁让你走上绝路？今天已经无解了，已经成为历史的谜团！

今天我们再回忆当年你的片言只语，荐健你不但无罪，反而是先觉者，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以一死对那个时代进行了最有力的抗争，对思想专制进行了血泪的控诉！

2009年，金文进曾去山东旅游。一个内容就是重登泰山，追念荐健同学。泰山的后山脚下，昔日四周直壁如斗的水池，是荐健献身的场所吗？现在已扩大成湖泊，还建有一个泰山文化大广场，乘汽车转缆车上岱顶的泰山景区专车在这里出发。冯玉祥先生的墓移到了高处。荐健的遗骨更不知哪里去了！

又据说荐健是从王母池走的。我两次去王母池，小小的尼姑庵，只有一个周长数米、浅浅的石砌的放生池。我问道姑，有没什么传说，回答说“没有”。

荐健同学啊！班上那么多人没有拉住你，你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的日子，你没能熬过十年浩劫，却独自走了！

荐健，你在哪里？

荐健在我们的梦里，在同学们的心里。

荐健是值得骄傲的，是汽02班的骄傲，是清华大学的骄傲，是那个时代的骄傲。

2017年5月2日修订

作者简介：金文进，男，1946年生，浙江义乌人。196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汽02班。陈长坤，男，1945年生。福建闽侯人。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汽车专业，1970年3月毕业。廖常初，男，1945年生，四川南充人。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汽车专业，1970年毕业。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